

图鉴版

中国 通史

主 编：梁隆炜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国通史

(图鉴版)

第四卷

主编 梁隆炜

中国档案出版社



第三节 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大陆和台湾的联系

在隋炀帝统治时期，隋与边疆各族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与台湾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隋唐时代，台湾称流求。高山族人很早就住在这里，他们的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台湾和澎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发现过彩色陶器，其纹饰与福建地区的非常近似。台湾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和有肩石碇，也与福建地区的文化面貌完全相同。

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和四年，炀帝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又派陈稜、张镇周带万人前去。他们从义安（广东潮州）出发，经高华屿（今澎湖花屿）、龟鳖屿（今奎壁屿）到达流求。流求人看见船舰，以为他们是商人，都去做买卖，这说明台湾与大陆早就有联系。

《隋书·流求国传》对台湾的风土、气候、物产、社会组织和生活情况，都有具体记载。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二、隋与西域各族的关系

隋朝初年西域地区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如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均在今新疆境内）、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拔汗、挹怛等“昭武九姓”国（今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带）。这些地方政权的人民，接受汉文化极深，有的就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例如高昌就是汉族敦煌人张孟明所建，以后的麹氏也是汉族金城（今甘肃兰州）人。炀帝在位，西域胡人多至张掖与汉人进行贸易。炀帝派裴矩至张掖，掌管互市。裴矩通过胡商，了解西域 44 国的山川地理、风俗、服饰，撰写《西域图记》一书，并绘制了地图多幅，面奏炀帝。书、图显示，当时从敦煌向西至“西海”（今地中海东岸），有三条通道：北道经伊吾（今新疆哈密）；中道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南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这就是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裴矩对炀帝说：西域诸国，“引领翘首”愿意臣服隋朝。然而，它们由于分别受突厥、吐谷浑的控制，交通受阻，致使“朝贡不通”。隋炀帝遂下决心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隋王朝用重兵打败了突厥，促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

为了防御突厥贵族的进犯，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并于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以东沿边险要处筑数十城。

突厥贵族不断进行混战，到开皇十九年（公元 599 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夏、胜二州之间水草丰美的地带（今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建大利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为突厥汗庭。不久以后，突厥牧区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很密切。

在解决了西突厥的问题后，隋炀帝着手开始准备解决吐谷浑的问题。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时由东北辽西迁徙青海地区。它征服了当地的羌族，建立了吐谷浑国。5 世纪中叶，吐谷浑的势力又扩张到今新疆东南部地区，辖境“东西三十里，南北千余里”，成为西陲的一个强大的势力。首领在北魏北周之际始称可汗，建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 45 里。人民大多从事畜牧业，逐水草而居，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出产大麦、粟、豆等，而牦牛、马、骡、铜、铁、朱砂等物尤多。马是这里的特产，传说是龙种，能日行千里，号称青海骢。吐谷浑风俗习惯多同于突厥，父兄死，则以后母或嫂为妻，而服饰略同于华夏。官制大体仿汉，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这时，吐谷浑已有文字，懂得历史，并有简单的法律，“杀人及盗马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决杖刑”。

南北朝时，吐谷浑和南北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隋初，吐谷浑趁机袭击隋的边境，并阻隔隋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 581 年隋文帝派上柱国元谐为行军元帅，在青海打败吐谷浑，其王吕夸（或作夸吕）逃走，部下投降很多。不久吐谷浑又来袭击，公元 583 年隋再派大将梁远击败吐谷浑。隋灭陈统一中国后，由于国力强大，吕夸不敢再来骚扰。公元 609 年，炀帝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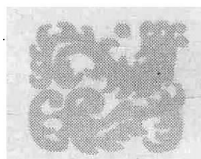
裴矩经营西域，同时派杨雄和宇文述率兵大破吐谷浑，其王伏允（吕夸子）逃走，直到隋末才恢复旧地。此后，隋炀帝在那里设置西海（今青海湖西岸）、河源（今青海湖南境）、鄯善、且末（今新疆且末县）等郡县，恢复同西域各国的贸易来往，加强了隋和西域各族的关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征服高丽的战争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东晋时，高丽人据辽东，奚、契丹、靺鞨等族受其控制。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文帝发兵30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炀帝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就是要为东征作交通运输准备。同时，炀帝命令山东（今河北、山东地区）广置军府，充实军马，整備武器。运输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炀帝命令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到涿郡，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

公元612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隋炀帝令左



右各 12 军分为 24 路，向平壤出发，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统率骑兵 40 队，步兵 80 队。骑兵每队 100 人，10 队为一团。步兵 20 队为一团。每团设偏将一人。又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兵夹路护送。每军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听皇帝指挥，不受大将节制。全军凡 113 万 3800 人，号称 200 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 40 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 40 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 960 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长 80 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隋炀帝依据高丽会投降的愿望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拒战。如此再三，隋炀帝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战败。大将宇文述等九军渡鸭绿江，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战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 4 万，逃回船上者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 30 万 5 千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 2700 人。隋炀帝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

失败并没有使炀帝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炀帝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东京改称）。消息传到前线，炀帝有后顾之忧，只好退



兵。

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炀帝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囚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在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炀帝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第四节 隋朝的灭亡

一、隋炀帝的暴政

1. 杨广杀父夺嫡篡位

隋文帝晚年“雅好符瑞，暗于大道”，生活上追求享乐，日趋奢侈。开皇十年（公元 593 年），他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县）督造仁寿宫，开山填谷，工程紧迫，民劳累死者上万人。两年后，宫殿建成，文帝和皇后独孤氏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大加赞赏，夸奖杨素忠心，赏钱百万，赐锦绢 3000 段。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文帝又从长安到仁寿宫建行宫 12 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察细行，不察大体，为人忌才。在他晚年，为政昏愤，不少功臣如刘昉、郑译、梁士彦、宇文忻等先后被杀或贬黜，“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所信者只有杨素，任其上下欺诈，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政道因兹弛紊”，为杨广的夺嫡篡位提供了方便。

杨广是文帝的次子，其兄杨勇为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杨广 13 岁封为晋王，20 岁被任命为指挥统一战

争的隋军主帅，功高权大，拥有军事实力，早有夺取杨勇太子位置的企图。他和大臣杨素、宇文述等勾结，收买官人和大臣为其在内廷虚美，“矫饰仁孝”，骗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文帝正式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63岁的隋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和杨素合谋，指使心腹张衡入宫刺杀文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杨广杀生父后，又矫诏处死杨勇，而夺得帝位。公元605年杨广即位称帝，是为隋炀帝，年号大业，并决定迁都洛阳。

2. 滥用民力

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奢侈腐化，滥用民力，刑罚残酷。他即位的第一年，就每月役使200万人营建东都洛阳，修造华丽的宫殿和花园。位于洛阳西郊的西苑，周围200里，内有方圆十几里的人工海，海中筑有高出水面十余丈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山上建有各式台观殿阁。海北有龙鳞渠流入海中，沿渠建造了16院。他还从全国各地搜罗奇材异石，花草禽兽。有的大木，一根要用2000人搬运，运到洛阳，要费几十万人工。炀帝还经常出外巡游，北到榆林、长城，西到张掖，三下江都。每次巡游，都要大肆挥霍勒索。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第一次游江都，出动了各类船只数千艘，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过州县，500里内皆令贡献食物，山珍海味多得吃不完就埋掉。回洛阳时走陆路，又下令征发各种毛羽皮骨，装饰车舆仪服，“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地方官为了多献礼物，以求升官，都拼命搜刮，许多郡县竟强迫农民预交十年的租调。



3. 穷兵黩武

隋炀帝即位后，一改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亲怀柔政策。企图炫耀自己的实力。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加速了隋灭亡的步伐。

二、隋末农民大起义

1. 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

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正当炀帝积极准备对高丽进行战争时，山东邹平县人王薄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内）领导农民首先起义。因为，这一带是世族地主统治根深蒂固的地区，人口集中，土地兼并较为严重，是隋统治者搜括财富的中心，也是进攻高丽的军备供应基地，当地人民负担兵役、徭役和赋税最为沉重。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这一带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大水淹没三十余郡，天灾人祸将人民推向死亡的边缘。因此，山东地区成为全国矛盾的焦点和农民起义的策源地。王薄起义后，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明确反对隋炀帝对高丽的战争，表示了反抗隋朝的决心。王薄领导的起义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起义爆发不久，“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长白山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演变成燎原之势。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农民，纷纷聚众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孙安祖、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鄆县（今山东夏津县）人张金称聚集农民在鄆县河渚中起义。）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领导一支农民军活跃在清河（今河北清河

县)一带。平原(今山东惠民县)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占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县境内)。各地农民起义的爆发,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2.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

翟让是瓦岗军的创始人,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了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河南滑县南的瓦岗寨,袭击隋朝的船只,夺取船上的粮食和布帛,以作军资。瓦岗军在战斗中,逐渐联合附近的小股农民军,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反隋队伍。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失意贵族李密加入了这支起义军,并逐渐成为领导人之一。这一年瓦岗军打出反隋暴政的义旗,攻破金堤关要塞,向军事重镇荥阳进军,炀帝派大将张须陁带兵镇压。翟让、李密采取诱敌深入,分兵合击的战术,在荥阳大海寺设下埋伏,大败隋军主力,杀张须陁。隋朝的“河南郡县为之丧气”。第二年,瓦岗军攻占隋军的大粮仓兴洛仓(今河南巩县境内),开仓济贫,深得人民拥护,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多人,成为当时农民军的主力,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发表讨隋檄文,指出隋炀帝的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隋朝统治。

3.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窦建德出身于农民家庭,因帮孙安祖反官府,全家都遭杀害。公元611年,窦建德率众200人,投奔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不久,高士达在作战中牺牲,他被推为首领,转战于河北中部,大败隋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在河间大败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南下的3万隋军,有力地支援了瓦岗军对东都洛阳的进攻。同年,窦建德在



河北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后改称“夏王”，建政权“夏国”，设置百官，后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控制了整个河北。他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自己布衣素食，艰苦朴素，深为河北人民爱戴。

4. 杜伏威、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杜伏威、辅公柘于公元613年参加长白山起义，后来因隋军的镇压，他们带领一支队伍向江淮转移，合并了一些小股农民军壮大了力量，称江淮起义军。公元616年隋炀帝由洛阳下江都，杜伏威驻军六合，对炀帝有威胁，炀帝派陈稜率禁军前往镇压，杜伏威率军奋击。公元617年，农民军在高邮大败陈稜的禁军，占历阳（今安徽和县），据丹阳（今江苏江宁），控制了整个江淮地区，并形成了对江都的包围。

三、隋朝的灭亡

1. 李渊太原起兵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军进入全盛时期，以瓦岗军为中坚，河北和江淮起义军为两翼，对隋王朝展开了毁灭性的攻击。农民军在河北、河南、山东和江淮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的统治。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底，隋所控制的地区，在北方只有东都洛阳以及其它几座孤城，在东南只有江都一隅之地，而这些地区都被起义军切断了联系，成为几个孤立的据点。

这时，一些官僚和豪强，看到隋朝的大势已去，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或拥兵割据，或起兵反隋。其中著名的有涿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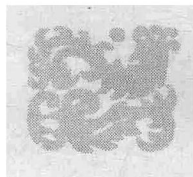


罗艺，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先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后迁江陵的肖铣，太原的李渊等。其中以李渊集团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公元617年秋，李渊打着尊隋的旗号，从太原起兵，进军关中。沿途收编了一些地主官僚的武装，队伍由3万人迅速发展 to 二十余万。11月，李渊攻克长安，控制了关中地区。

2. 江都兵变

三支农民起义军的胜利发展，使隋王朝受到沉重打击，隋炀帝在扬州已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但他仍在城内寻欢作乐，昼夜昏醉。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统治集团的核心已发生分裂。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禁军头目司马德勘和贵族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傀儡皇帝。接着，王世充拥立留守东都的越王侗为帝，称为皇泰帝。但秦王浩不久就被宇文化及杀掉，皇泰帝也被王世充杀死。李渊在隋炀帝被杀后，正式称帝，建立唐朝。从此，唐王朝取代了隋朝。



第五节 隋朝的文化

一、宗教

1. 佛教

隋朝在历史上是十分短促的朝代，但这一时期的文化由于南北统一而出现了大融合，文化较之南北朝有了更大的发展。隋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积极推行崇尚佛道的政策。隋文帝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用各种方式在全国倡导佛教。令旧时沙门重新入寺传教。听任天下人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寺、佛像，佛教因此大行天下。隋文帝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 46 藏，凡 13 万卷，修治旧经 400 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 612 藏，2900 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 90 部，515 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隋是这一时期的开始。

2. 道教

隋时，统治者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加以利用和支持，所以道教在北周被武帝禁止后，到隋朝又流行起来。



杨坚在夺周建隋时，曾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道书上说他“革周立隋，天所命也”。

杨坚称帝后，就用道教之神元始天尊的开皇年号，作为隋朝的开国年号。炀帝为晋王时，曾邀请道士徐则、王远知等至扬州镇所“请受道法”。他做皇帝后，造道观 24 所，度道士 1100 人。炀帝出游时，总有僧尼、道士、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但是，隋代道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远不及佛教。

3. 儒教

由于隋统治者采取重佛轻道尤轻儒的态度，隋时，三教中以儒教的社会地位最低。

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监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官。但是，应考诸生所据经学，有南有北，很不统一，博士无法评定高低。此后，隋朝不再举行儒经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隋文帝又借口当时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限在 70 人，这就大大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

二、文学、史学、音韵学和目录学

1. 隋朝的绮靡文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



个文学风格。

《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然而，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

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2. 禁私史、官修史

公元593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